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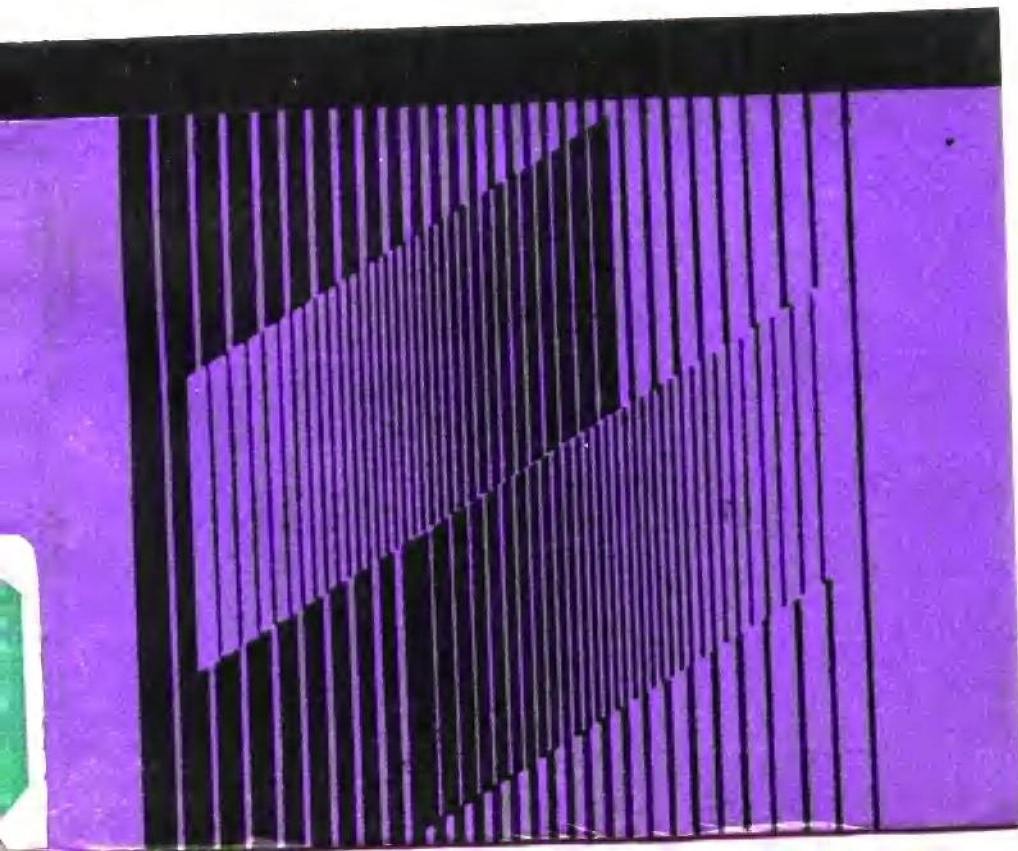


經濟科學文庫
JINGJIKEXUEWENKU

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

▶ 對制度的經濟分析

張宇燕 著



經濟科學文庫
JINGJIKEXUEWENKU

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

▶對制度的經濟分析

張宇燕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156号

经济科学文库

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

——对制度的经济分析

张宇燕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毫米32开

字 数：225 000

印 张：10.75插页 5

版 次：1992年10月第1版

印 次：1993年3月第2次印刷

册 数：3 001-6 500

书 号：ISBN7-300-01487-9/F·405

定 价：9.40元

《经济科学文库》

编委会

主编

黄 达

副主编

徐安琳 樊 纲 魏 杰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庆泉	马建堂	贝多广
王松奇	王逸舟	卢中原
叶 坦	刘 伟	李 扬
李拉亚	李晓西	陈 莹
陈东琪	杨瑞龙	张宇燕
林 岗	金 碚	钟朋荣
郭树清	徐安琳	高海燕
常 青	梁 晶	黄 达
黄小祥	黄泰岩	蔡 昉
蔡重直	樊 纲	魏 杰

经济科学文库·总序

人行研究所藏书
分类号 F11/949
总号 063312



063312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当今世界上有的人把经济学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们正在进行着经济改革，有关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切，总是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经济改革的成败，关系着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经济学家们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担负着无法推卸的重要责任，必须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为这一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部《经济科学文库》，就是对中国经济学家思维成果的记录，是为我国经济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服务的。

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伟大事业，不仅要求经济实践家们提出一系列直接针对当前现实问题的对策，也要求经济科学工作者提出一整套于理解现实问题有补、对解决现实问题有益的经济理论，作为战略研究和政策分析的基础；同时还要对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用丰富、翔实的经验资料，对各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各种政策的有效性，作出检验。过

去10年中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进入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正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上来。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改革事业和我们的经济科学将有更大发展的一个前提。《经济科学文库》作为一块新的科学研究园地,愿经济学家们的心血在此浇灌出更多、更美的鲜花。

《经济科学文库》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提倡追求科学、坚持真理、求实创新的学风,鼓励严肃认真的研究、扎扎实实的工作。相比之下,我们将更加重视研究成果的长久价值,希望今后人们能够看到这套丛书中的许多内容,经受了实践的长期检验而成为人类科学知识积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科学探索,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只要是严肃的探索,即使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会因为向人们表现了“此路不通”而为其他人通向真理扫清了障碍。正因如此,我们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积极而严肃的学术批判和学术争鸣。我们将积极扶植学术新秀,使《经济科学文库》成为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一块新的出版园地。我们还将尝试一些评价学术成果的新方式,加强学者与出版界的合作,在制度上保证丛书的质量。

希望作者和读者与我们一起,关心、爱护这套丛书,共同办好这部文库!

《经济科学文库》编委会

1991年4月

1

章

问题的提出：国家之兴衰

万事开头难。不过仔细思忖之后，方觉不尽然。这对做文章来说尤其是如此，因为大凡写作，多在胸中已有成竹，也就是说要讨论或解答的问题早已有之。当然，问题的确定本身亦非轻而易举，因为它首先要成其为问题，换句话说，作者本人恐怕需要阐明你选择某一对象作为问题的理由。本章作为开篇，打算引出本书将集中议论的问题：制度对人的行为、进而对国家兴衰的影响。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无疑要说明制度范畴，并且必然要将答案的产生融于对制度的起源与演进及功能的讨论之中。我在此引出问题的方式可能有点奇特，因为它表面上看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子。但笔者以为，这样做却还有其长处：突出问题的重要性，表明它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借此为我打算讨论的问题，提供一个经验性的基础。

§ 1.1 国家兴衰之谜

几乎每一位历史学家均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解开国家兴衰这个谜。同样，每一位具有历史感的人亦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准确地说是难以抵御它所具有的巨大的诱惑力。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庞大的帝国或文明衰败了，消亡了，而另一些则在财富上和文明程度上兴盛起来，尽管它们曾经是位于文明边缘地带的弱小部落。国家兴衰的例子不胜枚举。伟大的希腊城邦帝国最终为罗马所取代，而在这之前，后者是微不足道的。不讲情面的历史随后又导演了一幕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败落并被分散的部落所击败的历史剧。如以中国历史为舞台，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便更能清楚地发现那强有力的中华帝国不得不向人数少得多的、文明程度差得远的部族俯首称臣，如蒙古人或边远省份的贫苦农民。中东各国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的兴衰。当我们将视线移到兴盛国家上时，便不难看到，像罗马那样曾经是不值一提的民族成为历史舞台之主角的事例，同样是俯拾皆是的。17世纪增长的中心是荷兰的北部省份，这些省份从前却是无足轻重或贫困不堪的。恰恰是英国而不是更大和强有力的法国在18和19世纪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工业革命。然而，在19世纪后期，既不是法国，也不是英国，却恰恰是处于长期休眠状态的德国和遥远的英国前北美殖民地最迅速和最适当地迎合

了这场革命。^①

本世纪的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也有着相对迅猛的、并且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兴衰的轨迹。英国的相对衰落似乎是最令人瞩目的，同时也是人所共知的，以至许多有识之士称英国患了所谓的“英国病”，其主要症状是滞胀、国际收支危机、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分权主义日益严重的趋势等。^②作为衰落的英国的对立面，则是联邦德国^③和日本的经济“奇迹”。这是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在战争结束时，两国的经济已近崩溃。但今天又有谁能够无视其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伴随它而来的国家盛荣呢？东南亚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的高速经济增长亦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它们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难以与联邦德国和日本同日而语。

也许 20 世纪后半期最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之一，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了。在短暂的十年之内，中国开始走上了兴盛发达之路，尽管她步履蹒跚，而且路途艰难，但这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毕竟是迈出去了。说到此，这一切很自然地让我们回想起中华曾经享有的发达文明和技术，以及那些由于技术和经济的落后而遭受的耻辱。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所蒙受的屈辱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所获得的“光荣”均直接源于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产生于西方世界这一事实，那么提出它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文明中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的问题，无疑是合情合理的。要知道，在第 1 至第 15 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把自然知识应用

于人类实践的需要方面，比起西方要高明得多。^④中国，既是一个国家又代表一种文明，其兴衰盛败的历史本身的确是一个需要我们下大力气解答的一个谜。

说到了国家和文明，我们便不能回避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坚持认为，历史的研究单位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或社会。经过对英国的分析之后他说，英国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而且如果英国是如此，那么欧洲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在此观念的指引下，汤因比将整个世界按不同时期和地理位置分割成了 21 个文明或“文明社会”，其中包括古代中国社会和主要以中国文明构成的所谓“远东社会”。^⑤虽然汤因比在论述中用文明范畴取代了国家范畴，并由此为人们展示出了一幅更为宏大、更为壮丽的历史演化的画卷，但他关心的焦点却依然如故，那就是文明的成长、停滞与衰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文明为单位，那么，同样能看出或识别不同文明之间的长落盛衰。用汤因比的说法，古代叙利亚社会便是一个已经绝了迹的文明，而取而代之的是古代伊朗社会和古代阿拉伯社会。

国家也好，文明也好，在历史的长流中其兴衰荣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或出于好奇，或出于使自己所处的国家或文明免遭衰败之厄运的愿望，或出于使本国勃兴发达的热情，开始了对导致国家之兴衰原因的探寻。尽管到目前为止，前人或今人已经就此问题给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或答案，但说它迄

今仍是个谜可能还是恰当的。答案种类繁多本身，实际上就给问题增添了许多神秘感，更何况各个解释又都未能够尽解人惑呢！不过即使如此，了解一下已有的“谜底”对我们以后的讨论也还是会大有裨益的。

§ 1.2 某些尝试性解答

国家或文明之兴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看都不失为事实。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凡是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亦不会到此而停步不前。这里，关键点还在于对兴衰得以产生、正在出现或将要显露做出解释、说明和预测。在众多的解答者队伍中，也许最雄心勃勃的人非汤因比莫属了。在其宏篇巨著《历史研究》中，他用了绝大部分篇幅讨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的起源，文明的生长及文明的衰落问题。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汤因比使用了一个极为简单明了的，但同时又相当富于启发性和解释力的模型，即“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其基本含义可以简洁地被表述为：人类所以可能创造文明并不是由于它所拥有的生物天赋和地理环境，而是由于人类对于某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了应战。挑战即人类所处的逆境，它既可以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又可以是外部敌人的打击和不幸的刺激。成功的应战的结局便是文明的诞生及生长，而停滞的文明则由于它所面对的挑战和为成功地应战所付出的努力相抵

销了，以至再没有余力使该文明得以发展了。至于文明的衰落，其终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该社会应战的能力或创造力量丧失殆尽。^④

和汤因比相比，有些学者的“胃口”要小得多。《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将分析重点放在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军事冲突之上。他对世界格局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解释是，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突破可能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的优势。用肯尼迪的话说，蒸汽动力和它所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某些国家的相对实力，从而也降低了其他国家的相对实力；另一方面，在18世纪，当用以维持陆军正规军和海军舰队的费用惊人之大时，凡是能够建立起一个先进的银行和信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就能在许多方面比对手占有优势。类似的技术突破和组织创新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一旦生产能力增加了，就需要对财富加以保护，同时财富本身又是保护财富之手段的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过多地把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财富创造、特别是借军事力量来获取财富的巨资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则该国的国力就会相对被削弱。国力减弱的另一原因在于社会实行变革和技术创新的障碍过多，竞争受到压抑。反过来讲，国家的兴盛亦与此有关。^⑤

从上面简短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汤因比和肯尼迪之间的区别：除“胃口”和方法上的不同之外，使我们感兴趣的

是后者把国家的兴衰问题置于“经济增长”的框架之中。这至少从表面上看，离经济学比汤因比更近了一步；换言之，对国家兴衰的原因说明转到了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的分析上去了。如果我们沿此路走下去，我们就不得不对经济增长理论加以讨论。限于篇幅和本书关心的焦点，这种讨论只能用春秋笔法进行。广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那里，如李嘉图的经济增长过程理论。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发表后，经济增长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家们热衷的话题之一。其基本思路在于分析资本积累、劳动力和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同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⑧人们曾经认为，促成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把储蓄用于投资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和资本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可以被看作是此理论的典型。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指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显然是漏掉了两项内容，即“技术进步和按规模或比例的收益递增”。^⑨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种用于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所谓“余值”法。在此之后，爱德华·丹尼森对索洛模型中的“余值”（即扣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增加两因素贡献之后所剩下的因素）进行了更细致的、极富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分析，并说明了余值是由同技术进步相关的诸因素构成的，如教育、革新、资源流动等。^⑩

尽管索洛和丹尼森等人的工作相当出色，但在某些人看来仍非尽善尽美。曼库尔·奥尔森在赞扬了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后

又不无遗憾地说到,他们并未告诉人们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即究竟是什么刺激了储蓄和投资,是什么导致了创新,以及为什么许多创新和资本积累在某一社会或某一时期要比其他社会或时期更多。^①为了回答类似的问题,奥尔森展开了由他首创的所谓“共谋分析”或“集体行动分析”。为什么个人在某种刺激下会参加或拒绝参加集体行动,为什么小群体在特定条件下会联合成大规模组织并且采取一致的行动,以及集体行动的后果等内容,构成了共谋分析的骨架。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奥尔森给出了九项启示性的结论,其中心思想是稳定的社会(如边界不变)常常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共谋和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类似垄断组织),这些由特别利益集团构成的组织和共谋集团降低了它们所处的社会的效率和总收入,并且使得政治生活更加分裂不和;人们为追求集团利益而形成的所谓“再分配联合体”减弱了该社会采用新技术和随条件变化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从而使经济增长率下降,使得管理和政府的作用更加复杂并可能会改变社会进化的方向。在此理论的指引下,奥尔森对英国的衰落和日、德的“奇迹”进行了说明:在英国,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具有垄断性质且压制创新的共谋组织,无论是在二战后初期,如1949年,还是在二战前,如1939年,或是1971年,其比重要比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比重高得多。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奥尔森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独树一帜的论断:那些由心胸狭窄的利益集团充斥的社会,将因诸如战争和革命的摧毁而在经济增长方面获益匪浅。^②

尽管索洛和奥尔森都以经济增长及其源泉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后者显然更关心深层次的“制度僵化”问题。在以中国科技史为背景、以回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什么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发生之问题为目的的研究中，李约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和汤因比一样，他坚决地拒斥所谓地理决定论和人种决定论，指责那种无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归结为自发性和偶然性的作法。他努力到不同文明的结构中、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去寻求答案。最后李约瑟指出，现代科学所以只在欧洲取得突破，其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时期遍及欧洲的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即欧洲的贵族封建主义及伴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来的商业资本主义和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当时中国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或者说中国有着种种阻碍机制，如与富商的价值原则、格格不入的文官体制观念、中国人对以道义力量表现的暴力的信奉和“村民——君主”社会的不干预主义等。一言以蔽之，是社会结构在科技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④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东方世界的相对衰落便由此开始了。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的第一章叫作“西方世界的兴起”。有趣得很，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一本影响极大的书亦以此为名（在这巧合的背后，恐怕至少隐藏着这一议题巨大的吸引力吧！）。两本书的作者都试图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作出解释，但坦率地说，其各自的说明方式却是大相径庭的。肯尼迪认为，正是经济的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学术自由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了“欧

洲奇迹”。^①而《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作者则自信而肯定地说：“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换言之，“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思和托马斯在此将**有效的组织**定义为能够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财产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的活动，这种刺激会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使私人收益率接近或等于社会收益率的活动。^②他们拒绝承认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指持续的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只是把它们看作是制度提供刺激后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由于制度没有为创新提供刺激。至于为什么确立所有权的制度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原因也同样是简单明了的：其费用可能超过收益；难以阻止“搭便车”现象。两位作者还认为，对制度创新本身亦应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且意味深长地说，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乃是人口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学者不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兴衰问题的。约瑟夫·熊彼特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所谓**经济发展**，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指的是“对现存劳动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③或者说，是“执行新的组合”，即创新。在他眼中，创新同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同义语。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而发展又只能是创新的后果。熊彼特在此所说的执行新的组合或创新，包括五种情况，即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

得或控制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实现新的工业组织。^{①7}新的组合的实现被熊彼特称之为“企业”，而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被称为“企业家”。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中，是人，准确地说是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企业家的行为，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源泉。

我们在此列举了几位学者对经济增长或发展、国家兴衰问题的解答。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是对此类问题给予回答的全部，比如说我们至少还可以为这份名单增添两位——伟大的卡尔·马克思以及那位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威廉·阿瑟·刘易斯。马克思创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研究范式，无疑对我们思考此类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刘易斯对决定经济发展的六因素——其中第一条便是从事经济活动愿望和决定它的经济制度——的详尽分析，亦颇具综合性和启发性。在这里不论及他们，决非说其理论不重要，而是出于下述考虑：避免复述众所周知的理论以及避免雷同。^{①8}

§ 1.3 对前述诸种解释的简评 及本书的问题

汤因比模型，即挑战—应战（或迎接挑战），可以说是对文明兴衰的经典式概括。他用最精炼、最简洁的语言表述了以文明作为单位的演进过程和缘由。迎接挑战是人类的反应，是人类的选择，体现了在某一文明下生活的人群的价值。汤因比在